

商品经济大时代背景下的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变革^{*}

陈广亮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内置于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大时代背景下,商品经济形态阶段则是这一时代的本质定位。是以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初步认知、实践的经历,造成了政府在经济职能发挥上的部分越位、错位、失位,而随着倒逼改革的深入展开、经济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民族自信,健全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经济宏观调控、切实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则助推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中国梦的实现成为可能。

关键词:商品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职能;职能变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1-0010-0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成就。同时,改革的深入推进也暴露了制约继续前进的发展瓶颈。尽管我们可以说每一时代的社会发展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瓶颈危机,而整个世界的全球文明整合国际背景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社会变革问题的累积,却使得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拐点,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以促进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整体推进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议很大,隐现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

思想交锋的态势。交锋的其中一方坚持“中国模式”,认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关键,因而只需在正常修补中继续保持;另一方认同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但认为并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最多是“中国路径”或“中国经验”,因而为了建立有效市场,必须造就有限政府,即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双方的认识都有一定的道理,又都有一定的局限:前者坚持并侧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战略的本质区别,强调两种发展战略并非“隔行不隔理”,但缺乏深入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战略理论支撑;后者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相对而言具有更系统完备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能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发展给以合理实效的理论指导,但缺乏

* [收稿日期]2014-1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KS027)“基于以人为本实现路径的利益机制协同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陈广亮(1982—),男,河南林州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助教,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的能力。所以,从现当代世界所处的大时代历史背景和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出发,才是准确科学把握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脉门。

一、为什么要深化对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改革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越位

近现代世界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大时代是商品经济形态阶段,而由于商品经济阶段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在对物与关系二重复合中介依赖关系基础上,资本由于自身秉具的独特属性——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一样,资本具有物质外观和关系内核二重性,因而使资本生产过程成为劳动过程和资本社会关系生产过程二重化的辩证统一过程——成为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具体动力和实现社会普遍联系的中介媒质。^[1]资本轴动的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历经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整合、创新引领。在中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建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主导要素驱动式经济发展成为这一经济变迁、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政府的主导,即政府成为主宰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能够较大程度地动员和聚集服务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通过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强力执行,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基本战略规划的实现,形成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高效率。政府主导式经济发展能够在应对社会经济金融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具备很强的应急处理能力。但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要素推进式经济发展,又使得本来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公平正义、确保市场竞争参与各方利益合法合规实现的政府职能,反而成为包办一切经济运行的主宰者:既是市场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同时还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治理严重越位,从而造成了机动灵活的市场运转的萎缩、低水平的产能过剩、权力寻租的出现、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等。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错位

在商品经济形态阶段市场规划社会发展条件下,政府施政经济必须清楚应当充当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行使什么职能,这是确保其行为沿着正确轨道运转的关键。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总体定位而言,那就是构建良性的市场运行经济秩序,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以确保市场参与主体的公平竞争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却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首先是沿用旧体制下的角色扮演新体制中的角色,不是根据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具体情况,采取多方面协同参与、民主决策,而是依旧依靠政府拍脑袋决策、开会发文部署、一般化号召执行,调度检查落实。其次是政府经济职能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错位,未能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能干、廉价、引领、监督的主导角色凸显出来,而是参与执行角色过重,经济职能内部结构失当。政府不是特定时空侧重对社会经济的科学规划指导,而是抛开实际地盲目要项目、管项目,重复建设、建设短视。再次是政府经济职能职责内角色和职责外角色错位,把市场经济活动中分属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共同承担的不同经济发展职责,或者被政府以全能者承揽,出现不该管的现象;或者政府错误分配特定责任给职能定位模糊的部门,出现管不了的现象;或者政府错误分派职责给并不具备特定经济职能的部门,出现管不好的现象。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缺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两极分化,推进共同富裕。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在推进引领经济相对平衡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却始终隐含着一定的缺位现象,即本来应该由政府经济职能提供引领、服务、监管的职责,政府经济职能并没有充分尽职尽责,以致在一些经济领域出现自发发展状态。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在引领社会空间整体发展方面出现一定的缺位。习近平指出,“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2]事实上,不仅城乡之间在乡村经济发展上政府经济职能存在一定的缺位。国家

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侧重点突破式发展背景下,就在整体空间上东、中、西地区之间优先东部、城乡之间侧重城市、部门之间侧重公有部门、行业之间倾向尖端热门领域,因而政府经济职能在引领整体空间中非侧重部分方面就出现了一定的缺位。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存在一定的缺位,如在发展教育资源方面缺乏有力推进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发展;在政府提供公共卫生、医疗、养老等服务方面,推行过度市场化供给等。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监管方面出现一定的缺位。如国家信息产业部在推进网络互联网的市場化和确保有效竞争上对网络运营商垄断行为和垄断高价行为,并未给予必要的监管;针对房地产市场失灵造成的价格升降波动乱象,政府经济职能同样未给予有效监测;在规范城管治理和维护城市秩序方面,缺乏履行对城管工作性质与管理内容、城管待遇和城管思想建设等方面的科学管理。

二、商品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局限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并不是凭空产生在太虚幻境,而是具体根植于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所处的大时代和当代中国现实发展境况背景下的。当时推进经济体制革新的外因在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推进经济体制革新的内因。但由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现实世界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3]。而运用这种方法、方针、原则指引对世界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判断时,确立了当代世界运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内前进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并且经济建设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抓住了世界经济政治运转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经济政治运转的关键。而对这条道路的坚定推进,则

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巨大发展。虽然突破关键是推进整体根本发展的枢纽,但抓住关键,不等于抓住整体;不明晰关键之根源所在,最终又必将缺失对关键的把握。

一方面,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世界历史大时代背景认知而言,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时代的主题,但根据时代的主题并不等于时代,同样,时代的特征也并不等于时代,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也并不等于时代,它们都仅是时代在特定阶段呈现的属性或运行方式,而并非时代本身的原理,和平与发展并不就是当代世界时代的准确定位,坚持世界处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同样不是时代的准确定位。以和平与发展作当今世界的大时代定位,或者坚持当今世界仍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等等认知,把任何时代都普遍具有的发展特性或任何时代都必然具有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越位拿来指代当代世界所处的历史大时代,不仅是对当代世界所处历史时代的认知错位,更是对准确判定当代世界所处历史时代的认知缺位。所以,中国在三十多年探索当代世界所处历史发展时代课题上出现了认知局限。不过这是处于和全球文明密切交往初期实践的必然表现。

另一方面,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认知而言,逐步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与市场经济实现有机融合却未因政治的决断认知而得以学理疏解。2010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0”研讨会指出:“社会主义是否能搞市场经济、怎样搞市场经济,在理论上还缺乏深入系统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迄今依然是困扰中国的大问题”,毕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症结是社会主义的‘为他’与市场的‘利己’是相互排斥的,能否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是个问题。”^[4]因而尽管实践率先对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挺进准确地把握住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找到二者有机结合的学理依据。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两难悖论。^[5]具体到现实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实施者——政府而言,就逐

渐形成了不能结合(担心影响社会主义的主导优势)、不会结合(不清楚怎样的治理符合社会主义)、不愿结合问题(权力惯性致使权力利益格局不愿变动)。所以,中国在三十多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上出现了认知局限。这是对内置在商品经济阶段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初步实践的必然表现。

三、商品经济时代背景下优化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可能性和预期效果

(一) 优化经济职能的可能性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优化是社会各种建设的连接点和基础,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显露的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错位、缺位等局限表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于政府经济职能能否实现优化变革。那么,有无推进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可能性?推进政府经济职能优化改革的潜在条件又是什么?

一方面,从被动层面上而言,推进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可能性在于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的倒逼。现当代世界所处的历史大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商品经济形态时空运行阶段。这一阶段物质运转的商品不断扩大再生产性和扩大再交换性特征以及关系运转的不断全面拓展和不断深化拓展特征决定了运行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全面性和持久性,不断变革是这一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诞生并适应于这一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它必然需要通过不断的变革才能保持存在和继续发挥作用,而这其中就包括发挥着基础作用的政府经济职能的变革。不仅时代倒逼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变革,推进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积聚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有些甚至相当尖锐,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低水平等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不断改善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要求深入优化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牵引导向作用。

另一方面,从主动层面上来看,中国政府优化和变革经济职能的潜在条件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自信、理论认知的科学、民族发展的自信。首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指导下,通过实践的不断探索,逐步地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道路,根本性抓住和契合了近现代世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本质,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的继续深化变革奠定了正确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经济职能的优化变革是在“我们党对其目标路径都已明确”^[6]的基础上的改革,是遵循先易后难务实路线指引下遭遇的改革攻坚期和深水期,是在坚持道路正确自信基础上需要砥砺前行、担当、勇气的改革,而不是道路抉择的改革。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对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理论探究,正确地认知和把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区分。在认识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坚持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坚持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关联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关联等方面建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科学地表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行共进性(共产主义是二者迈入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阶段的科学替代)^[7]、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性^[8],丰富并坚定了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科学性。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推进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发展兼具的民族自信,有助于政府经济职能变革的成功。位于世界历史视域下的特定民族,不论先进与否,在与其他民族文明交往时,都应该是保持自我民族特性基础上的相互学习,而不是勃发时意气风发、夜郎自大,落后时手足无措、失掉自我。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世界民族文明交往中,经常兼具的强则天朝上国思维,弱则要么封闭保守、要么全盘西化意识,阻碍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各文明民族先进性的充分学习^[9]。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保持民族特质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理论和经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

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秉具了正确科学的民族文明交往意识和能力,因而中华民族的自信发展为成功推进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和变革提供了民族条件。

(二) 优化经济职能的预期效果

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预期效果是既非决绝地坚持传统政府主导式经济发展模式,也非完全放任、确保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而是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经济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平衡、递进式发展。

首先,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可持续运转。所谓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可持续运转,就是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就必须得遵循市场经济运转的一般规律。譬如在原有服务市场经济机制、法制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发展的市场经济,对其市场主体的准入、市场运营、市场退出、交易方式与条件等经济活动给以规范制约,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发育和完善;针对市场经济的局限,在其失灵尤其遭遇经济危机时,政府经济职能要充分发挥规制、引导和监管作用,以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

其次,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确保市场经济运转的社会主义方向。突出政府经济职能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强调在确保、推进市场经济运转时,必须同时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即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弥补单纯的市场机制“利己”本性,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所以,一方面需要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有为管理、监督。根据市场经济场域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只能发挥间接调控企业经营的行为,因而必须对国有公有制经济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企业获得经营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政府代表整个国家拥有所有权,能对资产所有权自由处置,以确保它的保值和升值。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必须完善社会分配机制,根据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推进国家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以确保服务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再次,政府的经济职能必须努力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以及同中华民族的特性有机结合。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推进中国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仍旧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已经越过了要素驱动式经济运行阶段,正处于效率驱动和亟需创新阶段,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经济运转必须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这种市场经济的坚持必须放置在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的治理边界之内,以确保市场效率驱动和创新发展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必须有机结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文明特性和民族发展目标。所谓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文明特性,就是在促使政府经济职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实现和中华民族文明精粹譬如儒家家庭伦理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推进对经济发展的追求而丧失了民族本性保持的精粹伦理道德。所谓符合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就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就是要逐步推进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族夙愿和实现现代化与国家强盛的民族宏愿。

最后,政府经济职能的运用必须切实服务于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人是社会的主体,“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不断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政府经济职能运用的根本定位就是“以人为本”,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政府经济职能不仅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同时还要把政府经济职能根本服务于推进公共性产品的建设,譬如加大对学校教学、公共生活水电等主要基础供应设施的投资建设。

四、推进商品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优化的现实举措

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运转的相对平衡、协调、持续、螺旋式前进,为了不断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必须继续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不断深化完善中国政府经济职能与商品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与民族特性的有机结合。在积极践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背景下,推进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和变革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根据商品经济时代社会运转的中介基轴依托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就要着力推进经济职能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转向确保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递进、从微观经济管理转向宏观引导,即让政府在经济职能上与市场职能做到科学区分:政府加快政企分开、政事分开革新进程,把应由社会行业协会承担的行业管理从政府管理回归其身;完善国有经济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减少、弱化财政对微观经济活动、国有企业财务的直接管控;合理区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的管理权,既要做到必要集中,又须注意适当分散;改革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对企业、事业单位、正规中介机构、群众自治组织能够自行做好的审批、审核或者备案等手续、程序,要注意简化程序、减少环节,加大监督背景下,提高服务效率和服质量;分离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和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职能,并注意保持各自的集中,取消政府在经济职能上既是裁判员、运动员,还是规则制定者的全能者形象。

第二,根据社会主义同样是商品经济时代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生产方式,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化变革,就要努力推进政府经济职能从对具体经济的全息引领到着重于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引领市场经济、从西方经济人本位假设和新发展主义经济理论影响转到根据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华民族智慧创造中国经济学理论话语引导,即针对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独立、分散经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就要站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上,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制定出短、中、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和实现途径、发展重点,譬如根据国家制定的经济长波发展“三步走”战略,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继续细化它在各个阶段的具体经济目标,在当代就是着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国家物权法,在推进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

时,明细产权和各自职责。确保国有、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流失。需要注意的是,在以社会主义方式引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思维模式,譬如唯GDP主义、凯恩斯主义等,根据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深化“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发展;根据中华文明特性,建构中华经济话语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引领,譬如在温饱——小康——富裕中华文明三步走战略指引的小康社会建设阶段,积极践行中国梦对经济发展的推进。

第三,根据商品经济阶段是“从狭隘地域的个人”^[10]或者“严格说来,这是作为共同体或群体的人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人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11]时期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11]阶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经济职能服务人民群众发展需要的宗旨,就要努力推进政府经济职能更加侧重从权力行政向责任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性政府、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递进。^[12]为此就要着力推进政府在教育、交通、医疗、民政社保等软件环境和水、电、交通、通讯等硬件环境方面公共服务职责的机制化实践,改革政府经济职能运用的政绩唯GDP主义评价体系,推进科学发展的评价体系建构,加强国家法制、监察等监督机构横向上对同位政府经济职能运用的监管、督察,增强、丰富政府经济职能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多方位、多层次互动反馈,这样就既充分地推进了政府经济职能运用的科学性、时效性,同时也极大地助推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实现。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2-393,104.
- [2] 习近平.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N].河南日报,2014-03-19(02).
- [3] 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1).
- [4] 朱可辛,郭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界的一次盛会——“社

- 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2010”述评[J].科学社会主义,2010(6):5-13.
- [5] 陈广亮.再论马克思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视阈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J].广西社会科学,2014(2):16.
- [6] 人民日报评论员.那么一股子劲不能松——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力量之二[N].人民日报,2013-11-11(1).
- [7] 陈广亮.再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自发性与博弈的自觉性根源[J].探索,2013(3):153-156.
-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9] 陈广亮.西学东渐的另类反思[J].兰台世界,2009(3):58.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
- [11] 黄楠森.人学原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411.
- [12] 吴大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域下政府职能发挥探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09).

(责任编辑:朱德东)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Age of Commodity Economy

CHENG Gua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merg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era, which belongs to the era of commodity economy. Due to its preliminary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great age of commodity economy, caused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to play offside, dislocation and loss of its position. As forced reforms, confidence in developing the economic and owning advanced scientific theories, supporting of national civilization, improving the market economic order, making the economic macro-control well-considered as far as possible and ensuring to service needs of the masses, which boosts the organic unity of market economy, socialist China and thus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will be possible.

Key words: the great age of commodity econom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functional reform